

必然還要反覆再做的事

吳嘉苓、曾熾芬

「他知道他要講述的故事不是一個獲得最後勝利的故事，而是人必須做什麼，在那永無休止的戰鬥中必然還要反覆再做的事。」（卡繆，瘟疫）

2003年4月底和平醫院封院，SARS疫情在台灣迅速蔓延，社會緊繃。多位台大社會學系同仁以及一些學界友人，憂心之餘不免捫心自問：「從社會學的角度，我們能為SARS防疫作什麼？」當時大家以台大社會系為基地，在318研討室密集聚會，迅速建立了「SARS與台灣社會」網站(sars.social.ntu.edu.tw)，作為參與防疫的平台。系上同仁陳東升、林鶴玲、林國明、藍佩嘉、賴曉黎加上我們，還有黃長玲、陳明祺、方念萱，以及一群認真的研究助理、學生，大家以各自的專長領域，從國家、醫療組織、社會不平等、媒體建構、國際遷移等諸多角度，理解SARS與社會，試圖提供政策建言。

這是這篇論文的起點。當時，我們的集體行動主要希望透過社會學知識，試圖在這個前所未有的疫病控制所引發的混亂中，提供一些系統性的觀點與看法。從那裡出發，許多同仁（包括我們）繼續深化有關SARS的研究，陸續發表學術論文，SARS或許不會再來，但是社會學研究者不該遺忘它帶給台灣社會的挑戰。這篇論文正是要繼續講述那必然還要反覆再來的疫病風險控制。

AIDS是個前例。1980年代在歐美國家，當AIDS成為挑戰社會的一項重大新興傳染病時，有許多醫療社會學領域以外的研究者，加入了研究AIDS的行列。SARS以它所引發的恐懼以及政策的各種錯置，也值得社會學者從各種角度來研究SARS與社會的議題。然而根據本文的發現，SARS研究存在著學術分工，社會人文的研究遠較醫護生物的角度來得少。傳染病是一項被社會學家、甚至醫療社會學家低度研究的領域，但傳染病將繼續對現代社會提出更大的挑戰，社會學研究者不能缺席。

在SARS疫情終結、「SARS與台灣社會」網站也完成階段性任

務之後，我們靜心從事學術深化的工作，才發現最初對於科學治理內部的缺乏探討，使得我們一開始的建言與批評，並未直指核心。本文所批評的「將防疫政策的科學基礎以及風險內涵視為給定的背景」，也包括了我們自己早先的盲點。也許是時間倉促，也許是STS觀點還沒有深入骨子裡，最初我們也鮮少把科學治理的權威機構所提供的知識與資訊，當作是需要社會學問題化的面向。解除旅遊警示是根據什麼科學基礎？B級居家隔離又基於何種新資訊？當時我們不曾問過這樣的問題。而這次的學術勞動，讓我們學會，下一次與疫病相遇時，社會學家的探照燈，必然要記得投向科學治理的內部。